

宋代中国人与巴厘岛之 关系初探

——从“江金花”传说切入的研究

• 郭宗华 (KOH Chong Wah) *

摘要

巴厘岛民自古有敬拜祖先的传统，并使用中国香祭拜先人和神明，且在各种生活和宗教仪式里都以中国铜钱为祭品，显示巴厘岛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遗憾的是，无论中国史料抑或当地文献，与中国人相关的叙述非常稀缺，并不足以让史家建构出古代中国人与巴厘岛民接触并将中国文化传入该地的历史过程。不过，如今在当地广泛流传的“江金花与国王加亚·庞古斯结合”的故事，或能成为开启“古代中国与巴厘岛关系”研究的一把钥匙。本文把与“江金花”相关的各种传说与神话中奇幻、虚构、附会的情节层层剥离，留下其合理及符合历史事实的细节，再结合相关文献与当地的考古成果，勾勒出一系列宋代中国人到巴厘岛经商与移民、与当地相互通婚、中国文化融入当地文化的历史片段，为“传说可以证史”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案例。

关键词：宋代中国人、巴厘岛、中国铜钱、江金花、传说

* 郭宗华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助理教授。

Email: chongwah.koh@xmu.edu.my

一、多元文化的巴厘岛

巴厘岛，是位于南太平洋上与爪哇岛隔海相望的一座美丽岛屿。其地理位置邻近赤道，气候温暖湿润，物种丰富多样。整座岛屿的海岸线几乎都被平缓绵长的沙滩包裹着，山川河流、湿地雨林、高原火山、湖泊瀑布等自然景观都能在这座面积不大（5,780 km²）的岛屿内找到。大部分岛民皆信奉印度教，岛内各处印度庙林立，往往五步一小寺，十步一大庙，堪称“千寺之岛”。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完整保留，使得其民俗、文化、饮食等各方面皆与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印尼乃至岛屿东南亚的其他地方都截然不同，身处于巴厘岛，仿佛有自己不是身在印尼的错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独具特色的风土民情，造就了巴厘岛在近几十年来成为许多海内外游人向往的度假天堂。小小的巴厘岛，总能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们不同的需求和喜好。

巴厘岛民普遍热情好客，对任何事物皆抱持开放态度，也是其能让各国游客们宾至如归、流连忘返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优点可能源自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多元、包容、和谐是巴厘岛文化的内涵。在巴厘岛的传统文化与宗教习俗中，往往可以找到其他宗教、文化的些许元素。巴厘岛文化主要由本土文化和印度文化构成，由于历史因素，也曾受爪哇文化和荷兰文化的些许影响，除此之外，来自中国的一些文化习俗也在巴厘岛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巴厘岛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有敬拜祖先和先人的传统，即便是印度教信徒，在祭祀神明和先人的仪式中也普遍使用中国的香（hio）。不仅如此，岛上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型印度教



寺庙，如金达玛尼区（Kintamani）的乌伦·巴杜尔庙（Pura Ulun Batur）、巴陵江庙（Pura Dalem Balingkang）、曾帕加区（Cempaga）的克恒庙（Pura Kehen），以及坐落于阿贡火山南麓的全巴厘岛最大的贝萨基庙（Pura Besakih），上述庙宇内都专门设立一至两座中国式或佛教式的祠堂或神龛（图1、图2、图3、图4），相信是为了祭拜过去曾对巴厘社会有功的一些中国先人。¹

¹ 关于巴厘岛印度神庙里的中国式祠堂到底是供奉谁的问题，众说纷纭。李炯才（1979）和孔远志（1995）的文章中说乌伦·巴杜尔庙里的中国祠堂“三宝灶婆公”，是祭拜郑和属下的一位“江”姓厨司。我在2019年7-8月考察乌伦·巴杜尔庙时，该中国祠堂已翻新，其名字被改为“总铺公庙”。一位义务打扫祠堂的当地善信告诉我，这祠堂是祭拜“中国公主江金花”的父亲。之后，我也曾询问过当地华裔退休教师黄振文先生，他说那座中国祠堂不是祭拜“江金花”的父亲，但他也说不上来到底是祭拜谁，只知道祭拜对象姓“林”，而邦利县的文化工作者萨达纳则说那祠堂祭拜的是“财神”（Dewa Kesejahteraan）。我考察贝萨基庙时，也曾在该庙长老的指导下进行祭拜该庙的两座中国式神龛的仪式，仪式后，我问长老该两座神龛是祭拜谁的，长老回答我：“要祭拜谁都可以。”另外，在一些当地学者的著作中提及这些中国式祠堂大部分都祭拜“Subandar”，Subandar即马来语“港务官”（Syahbandar）的讹称，这些Subandar应该是古代巴厘管理港口及经营商业贸易有功的华人，传说江金花父亲也曾任“Subandar”。结合学者的看法、当地人的说法和我的考察经验，我认为巴厘岛印度庙里的中国祠堂或神龛，最初设立时可能有特定的祭拜对象，但时过境迁，现在人们或许早就遗忘了祭拜的到底是谁，只知道是祭拜历史上曾对巴厘社会有功的中国先人。





图1：乌伦·巴杜尔庙内的“总铺公庙”（摄于2019年7月26日）。



图2：巴陵江庙内的中国式祠堂（摄于2017年8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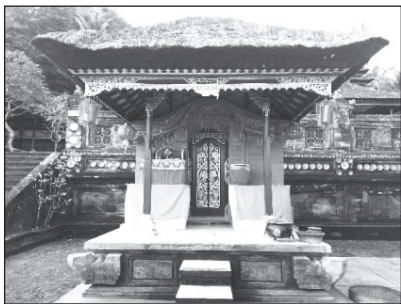


图3：克恒庙内的中国式祠堂，其另一独特之处是祠堂后面的墙上镶嵌着许多中国陶瓷器（摄于2019年7月25日）。



图4：贝萨基庙内的两座中国式神龛（摄于2019年7月27日）。

巴厘岛文化习俗受中国影响最明显之处，便是中国铜钱（Uang Kepeng Cina）的广泛运用。在巴厘岛发现的中国历代铜钱，从汉代至清代都有（Ardika *et. al.* 2015: 216）。根据当地古代铜钱收藏家兼学者哈达万（I Dewa Nyoman Putra Harthawan）的说法，早在公元初期，中国的铜钱在巴厘岛已被用作物物交换的媒介（Harthawan 2011: 30）。最晚在14世

纪末，已有巴厘岛民使用中国铜钱来缴纳赋税。²此后，中国铜钱一直是巴厘岛内流通的主要交易货币之一，直到巴厘岛被并入印度尼西亚（1949年），印尼政府于1951年规定以印尼中央银行发行的印尼盾（Rupiah Indonesia）为法定交易货币（Astuti 2014: 46），铜钱作为当地货币才被取代。即便如此，中国铜钱至今仍广泛运用于巴厘岛的宗教、文化、艺术与生活中³，主要作为各种重要宗教仪式以及出生、婚礼、丧礼等生活仪礼中奉献给神明及先人的最高价值的祭品，献祭的铜钱越多，表示该仪式越隆重、越显贵（Harthawan 2011: 101）。由于现当代中国基本不再生产铜钱，而巴厘人对铜钱的需求仍然很大，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当地甚至有专门制作铜钱的工匠（Sudana *et. al.* 2001: 18）。巴厘岛生产的铜钱，正面印有中文字样，与中国古代的铜钱无异，背面印的则是巴厘文字，可说是中国文化与巴厘文化相互融合的最佳例证（图5）。此外，还有以巴厘岛特色图纹仿铜钱制成的金属祭祀币以及以五种金属仿制的五色中国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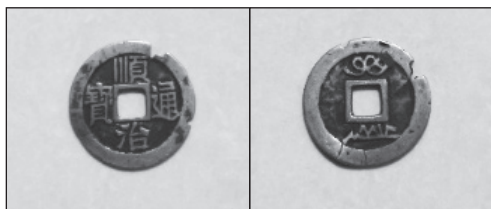


图5：巴厘岛生产的铜钱（摄于2019年7月24日）。

² 在当地发现的篆刻于1388/1389年的碑铭“Prasasti Tambling”里，记录了淡比陵（Tambling）村居民用中国铜钱缴纳村落的赋税。见于Harthawan（2011: 121-122）。

³ 铜钱除了广泛作为人们宗教、生活仪式中的贡品外，在巴厘岛还能常看到一些以铜钱为主要材料制作的手工艺品，民间也有一些用铜钱来进行的传统游戏，如plinceran、matoggog和makeles。见于Sudana & Budiastara（2001: 41-46）。

钱，象征巴厘印度教五大神明（欧芮2019: 36）。

巴厘岛在历史上曾被爪哇满者伯夷（1343-1520年）占领过，15世纪下半叶开始满者伯夷被诸伊斯兰政权⁴取代后，也有许多爪哇印度教精英逃往巴厘岛。18世纪末起，荷兰人逐步蚕食了与巴厘岛仅一水之隔的爪哇岛，于1840年开始也将其触手伸入巴厘岛，通过合约与战争的方式迫使岛内诸政权陆续屈服，至1908年将整个巴厘岛纳入直接统治（Pringle 2004: 94-105）。因此，巴厘岛文化中带有爪哇与荷兰的元素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巴厘岛与中国之间相隔千里，中国人也不曾占领或统治过巴厘岛，何以中国文化在巴厘岛的影响既深又远，且历久不衰？这不啻为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中国历代官方史料中最早关于巴厘岛的记录，也许是《梁书》中的“婆利”，但也有学者认为《旧唐书》中的“堕婆登国”可能才是巴厘岛，此外，南宋《诸蕃志》（1225年）中的“麻篱”（赵汝适1940: 28），元代《岛夷志略》（1341年）里的“彭里”（汪大渊2005: 51）或许也是“巴厘”的译称。然而，《梁书》叙述婆利“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姚思廉1995: 472），真正的巴厘岛显然没有《梁书》里形容的“婆利”那么幅员辽阔（Narendra 1963: 15），而“婆利”也有可能指的是其他地方。⁵《旧唐

⁴ 包括在今中爪哇建立的爪哇第一个伊斯兰政权淡目苏丹王朝（Kesultanan Demak, 1475-1568）、巴章苏丹王朝（Kesultanan Pajang, 1568-1586）；西爪哇的井里汶王朝（Kesultanan Cirebon, 1482/1552-1926）；爪哇岛西部的万丹苏丹王朝（Kesultanan Banten, 1552-1813）；中爪哇、东爪哇的马打兰苏丹王朝（Kesultanan Mataram, 1587-1755）等。

⁵ 法国学者伯希和（P. E. Pelliot）认为《梁书》中的“婆利”是巴厘岛。



书》则载“堕婆登国，在林邑⁶南，海行二月。东与诃陵⁷、西与迷黎车⁸接，北界大海。风俗与诃陵略同。其国种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书之于贝多叶。其死者，口实以金，又以金钏贯于四肢，然后加以婆律膏及龙脑等香，积柴以燔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其王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太宗玺书报之，并赐以杂物”（刘昫等1995: 3363）。参考上述有关“堕婆登”一些风土民情的描述，与如今的巴厘岛相当类似，不过，“堕婆登”也未必是巴厘岛。⁹至于《诸蕃志》的“麻篱”和《岛夷志略》的“彭里”，书上仅提及该地名，并无附加任何叙述。换句话说，尽管中外学者从中国历代史料里找到一些“可能”是巴厘岛的叙述，但至今连何者是巴厘岛都

如果伯希和是正确的，则最早提及巴厘岛的中国史料是《梁书》。然而，“婆利”也有几种说法，一说指婆罗洲北部的政权（古代文莱），一说是苏门答腊亚齐的一个政权“Puri”的译名。

⁶ 林邑即今越南中部的一个古国，也称“占婆”。

⁷ “诃陵”一般被认为是现在的爪哇，也称“社婆”、“阁婆”。

⁸ “迷黎车”有很多种说法，一说迷黎车为“马六甲”的梵语“Meleecha”的译音，一说其为今缅甸东南的“墨吉”（Mergui）的译音，一说为印尼苏拉威西以西的摩鹿加（Maluku）。

⁹ 荷兰学者格罗内维尔德（W. P. Groenevelt）认为《旧唐书》中的“堕婆登”是巴厘岛，因其叙述中提到的当地风俗皆与现在的巴厘岛基本吻合，且提及其在诃陵（今爪哇）以东。西方学者一般将“堕婆登”译为“Dva-pa-tan”，一些巴厘当地学者也认为“堕婆登”是巴厘岛，将其译为“Dwapatan”。见于Proyek Penelitian dan Pencatatan Kebudayaan Daerah（1978: 54）。不过，我认为该文中“东与诃陵”的意思应该指的是“堕婆登的东边是爪哇”，与格罗内维尔德所理解的正好相反。此外，“堕婆登”的位置还有其他说法，有人主张其在克拉地峡，或在苏门答腊，或在爪哇西部的万丹，皆位于爪哇的西边。总之，很难断定到底何者是巴厘岛。



没有统一的说法，更不用说能够通过这些零星的记录来了解与建构历史上巴厘岛与中国的关系。

由于相关历史记载非常缺乏，我们如今已很难确知中国的一些文化习俗如何在巴厘岛这个异域土地上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以至于完全与当地文化习俗融为一体。不过，这也无疑是给了民间广泛流传的传说与神话更多的解释历史的机会与空间。

二、“江金花与古巴厘国王加亚·庞古斯”的故事

关于巴厘岛文化受中国影响的缘由，如今许多巴厘岛民与当地华人皆将其归功于一位嫁给了古巴厘王朝（Bali Kuno，约913-1343年）国王加亚·庞古斯（Raja Jaya Pangus，1177-1181年）¹⁰的中国女子。据说这位中国女子貌美如花，让国王加亚·庞古斯一见钟情，想要娶她为妻……接下来的故事发展，版本众多，情节各异。这位中国女子名叫江金花（Kang Cing Wei）¹¹，一般认为她是某个来自中国的商人到了巴厘岛和当地

¹⁰ 截至2015年，已发现的由巴厘国王加亚·庞古斯颁布的碑铭（prasasti）至少有49块，年代都介于1177年至1181年间。不过，当地学者普遍认为加亚·庞古斯不可能只执政短短4年，也许其实际执政时间长达30-40年。见于Pemerintah Kabupaten Gianyar（2015: 50-51）。

¹¹ 该中国女子的名字在当地的的文章与著作一般被称为“Kang Cing Wei”或“Kang Cing We”，一些中国学者将其译为“江蔷薇”或“江金花”。根据退休教师黄振文先生的说法，该中国女子的中文名字叫“江金花”，“Kang”即闽南语“江”，“Cing Wei”其实是闽南语“Gim Hue”（金花）的讹称，因当地人没办法准确念出“Gim



女子生下的女儿，也有一些当地人称呼该女子叫“宋江王后”（Ratu Cung Kang），认为其来自宋代中国，甚至有人说她与宋朝王室有些关系，把她称作“中国公主”（putri Cina）¹²（Sulistyawati 2011: 18）。

一位当地华裔梁之海先生告诉我，江金花与国王加亚·庞古斯结婚前，曾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是要国王敬拜中国的祖先，所以现在许多印度庙里有中国祖先的神坛；第二是要国王使用中国铜钱来敬拜祖先，所以现在成了巴厘岛人的风俗习惯，都以中国铜钱来敬拜神明和祖先；第三是要国王磨平犬

Hue”。本文便根据黄先生的说法，将“Kang Cing Wei”译为“江金花”。

- ¹² 在古马来语中，“putri”（puteri）的原意为“公主”，也可以是“姑娘”、“女子”或是“女儿”，所以“putri Cina”指的是“中国公主”，也可以指“中国女子”、“中国女儿”，如果没有加以说明该“putri Cina”的身份来源，根本无法分辨“她”到底指的是“中国公主”还是“中国女子”。在爪哇语、巴厘语等印尼群岛范围内许多地区的方言里，“putri Cina”的语义也跟古马来语基本相同。我在博士论文《东南亚的“中国公主”传说研究》共罗列了10则东南亚地区流传的“中国公主”传说和神话，按故事的性质，可归类为“传说”的共有7则。7则“传说”里，至少有5则“传说”中的“中国公主”或有其“历史原型”，即巴厘岛的“江金花”、文莱的“京那巴当岸公主”（puteri Kinabatangan）、马六甲的“汉柳公主”（puteri Hang Liu）或“汉丽宝公主”（puteri Hang Li Po）、爪哇满者伯夷的“中国公主萧琬琪”（putri Cina Sio Ban Ci）、爪哇井里汶的“凤珍公主”（putri Ong Tin），她们的最初身份皆为中国商人、华侨首领或华回宗教师之女。其中，后4者在流传过程中，该中国女子的身份被提高为“中国国王（皇帝）之女或亲戚”，故事讲述者甚至为她们编造了与“公主”相称的情节桥段。仅巴厘岛的“江金花”，并无明显被编造其为“公主”身份的情节，无论“传说”还是“神话”版本，其仍只是中国商人之女，由此“江金花”传说可能比起其他4则传说更加贴近历史事实。



牙，因为当时巴厘人普遍吃生肉，犬牙较长，所以现在巴厘岛所有的孩子成年前都必须经历“磨牙”仪式（Upacara potong gigi）（梁之海，写作者谈话，巴厘岛萨努尔，2019年7月18日）。另一位当地华裔退休教师黄振文先生也曾告诉我他小时候听闻其祖母述说的版本，该版本中江金花提出的三个结婚条件与梁先生的说法又有些不同。¹³此外，甚至有江金花婚前提出五个条件的说法。¹⁴

在当地一些巴厘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书籍中，也有提及江金花把使用中国铜钱的习俗带来巴厘岛的说法，例如当地学者苏里斯亚瓦蒂（Ir. Sulistyawati）的一篇有关巴厘华人文化的文章中便称：婚礼进行时，江金花的父亲把两枚中国铜钱交给女儿，要她把铜钱献给国王加亚·庞古斯，以表效忠。此后江父每年都会献上一批铜钱予巴厘政府，以提振巴厘岛经济。江金花与其父效忠国王的方式，巴厘人民纷纷仿效，将铜钱进献给他们敬拜的国王或神明（Sulistyawati 2011: 116）。2009年由巴厘文化局（Dinas Kebudayaan Bali）编译出版的《巴陵江庙史诗》（*Purana Pura Dalem Balingkang*）¹⁵则说：婚礼结束

¹³ 根据黄先生的说法，该三个婚前条件是：第一，要国王磨牙；第二，要国王使用中国铜钱敬拜中国的皇帝，因铜钱上有皇帝的年号；第三，江金花去世后，火化其遗体，把骨灰洒向大海，随潮流回到中国（黄振文，写作者谈话，巴厘岛登巴萨，2019年7月30日）。

¹⁴ 结婚前，江金花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国王必须停止吃生肉；第二，国王必须磨平獠牙；第三，广建佛寺遵佛法；第四，给予佛教同等于印度教的地位；第五，在各种宗教仪式中使用中国铜钱。见 Swadiana（2008: 31）。

¹⁵ 根据巴陵江庙长老的说法，《巴陵江庙史诗》是巴厘文化局（Dinas Kebudayaan Bali）于2009年编辑翻译的，并不是古代史书。有关巴厘王与江金花成婚的故事，不曾出现于巴厘岛任何现存的古代史料中。



后不久，江金花的父亲准备了两枚铜钱交给女儿，要她把铜钱献给国王以表效忠。随后，国王便下令此后全国人民在各种仪式中使用中国铜钱（Tim Penyusun 2009: 33）。

尽管细节有些不同，但上述传说皆要说明巴厘岛文化习俗受中国影响，可以追溯至古巴厘国王娶了江金花的事迹，尤其如今中国铜钱的广泛使用，也是由江金花与其父最先开始的。江金花通过与古巴厘国王结婚的方式，把中国文化传入巴厘岛，此外，也带来了先进的种植、务农、建筑技术，以及各种日常生活的技能与习俗（Qin 2023: 79）。

长期以来，古巴厘国王加亚·庞古斯与江金花的故事广泛流传于在巴厘岛东北部的金达玛尼（Kintamani）地区（图6），在当地人的口耳相传与艺术加工之下，衍生出各种版本的传说与神话。其中一些“传说”类型的故事版本，主要用来解释巴陵江庙（Pura Dalem Balingkang）建立的历史渊源。尽管此类传说版本众多，但其基本桥段都是：国王不顾大臣反对，坚持迎娶江金花，引发天谴（狂风暴雨）导致原本的都城



图6：巴厘岛与金达玛尼地区（利用谷歌地图自行修改）。



图7：金达玛尼地区，与“江金花”传说与神话相关的地点与神庙（利用谷歌地图自行修改）。

被摧毁，国王带领人民迁移到如今金达玛尼区平安村（Desa Pinggan）附近（图7），建立新的王都，被称为“巴陵江”（Balingkang）。

例如在《巴陵江庙史诗》中叙述：加亚·庞古斯原本居住的宫殿建在帕纳拉穹山（Gunung Panarajan）上（图7）。他在位时，有两名谏官（penasihat），其中一位名叫“西瓦·甘都”（Mpu Siwa Gandu），是印度教长老；另一位则是“林”（Mpu Lim），是佛教长老。谏官林身边有一位属下名叫江金花（Kang Cing We），她是中国商人苏班达（I Subandar）¹⁶

¹⁶ “Subandar”即“Syahbandar”，“Syahbandar”最初源自波斯语，意为“国王或港口头领”（raja atau kepala pelabuhan）。见于Suarbhawa（2010: 223）。当地学者认为Subandar应该是古巴厘时代协助政府管理港口及经营商贸的华人。大部分的故事里称江金花的父亲是Subandar，但没有提及其实姓名。目前为止，我只看到有一篇文章中说江金花的父亲叫比丘江四塔（Biksu Kang Si Ta）。

与巴厘女子生下的女儿。据说江金花长得很漂亮，国王想娶她为妻。然而，谏官西瓦·甘都反对，并且警告国王绝对不能娶江金花，因为国王信奉印度教，而江金花信佛。¹⁷ 国王并没有采纳西瓦·甘都的建言，甚至解除其谏官的职务，并立即举行婚礼。西瓦·甘都心怀怨恨，遂立下诅咒，请求神灵降下狂风暴雨，大雨持续长达1个月7天¹⁸，导致帕纳拉穹山上的王宫被彻底摧毁。灾后，加亚·庞古斯只好带着剩余的部属与人民来到莱斯穹村（Desa LeJong）的森林开荒，建立新都城。新建立的圣堂（Bangunan Suci）¹⁹就叫巴陵江庙（Pura Dalem Balingkang）（图7）。“Balingkang”一词，来源于“Bali”和“Kang”，其中“Kang”就是取自江金花的姓氏（Tim Penyusun 2009: 32-35）。

见于Sulistiyawati（2011: 15, 17）。其实，“Biksu Kang Si Ta”这个名字出现于公元882年颁布的碑铭“Prasasti Sukawana AI”里，原名“Bikshu Siwakangsitan”（比丘西瓦江四坦），其大意为：“在金达玛尼地区，没有地方给来回走动的人歇息，因此我（国王）命令名叫Kumpi Mardaya的Senapati Danda（某官员）、Bhiksu Siwakangsitan、（Bhiksu）Siwanirmala和Bhiksu Siwa Prajna在狩猎区建造隐居所和宾馆……”。见于Suarbhawa & Suryana（2013）。根据其内容，无法确定“Bikshu Siwakangsitan”是不是姓“江”或是中国人，也由于该碑铭颁布的时间（882年）与加亚·庞古斯（1177-1181年）的年代差距较大，所以即便他确实姓“江”且是中国人，也不会是江金花的父亲。

¹⁷ 另一个版本则说印度教长老们皆反对国王娶江金花，因为她是商人的女儿，也不知道她的种姓阶级，并预言如果国王坚持娶她，将会带来巨大灾难。见于Bandem（2011: 92）。

¹⁸ 另一个说法是狂风暴雨持续长达42天。

¹⁹ 大部分版本称巴陵江庙就是加亚·庞古斯当时居住的新宫殿，也有的说该庙当时是给印度教和佛教僧侣的静修之地（tempat pertapaan）。



我在巴厘岛邦利县（Bangli）时，访问了一位曾将古巴厘国王与江金花的故事改编成“Legong Kang Cing Wei”传统舞蹈演出的文化工作者达萨纳（I Nengah Darsana），他告诉我的版本与《巴陵江庙史诗》中的故事大致相同，仅故事中一些情节与人物稍有不同。他说：“这个故事来自佩努里散山顶（Puncak Penulisan），以前这个地方叫做帕纳拉穹（Panarajon）王朝。国王加亚·庞古斯结识了来自中国的商人，他叫做夏班达（Syahbandar），意思是中国商人的首领，从巴厘岛北部的新加拉惹（Singaraja）附近登陆（图6），在那里做生意。他的女儿叫江金花。国王看到他的女儿很漂亮，便想要娶她为妻，而江金花也对国王有意，两人彼此相爱。另一方面，夏班达在这里经商，也要寻求国王的庇护，最后，国王和江金花便在夏班达的同意之下结婚。”

“不过，那时有一个名叫西瓦甘玛（Mpu Siwagama）或一些版本中名叫西瓦甘都（Mpu Siwagandhu）的印度教长老表示反对，因为两人的宗教不同（加亚·庞古斯是印度教徒，而江金花是佛教徒），而且没有和异教徒结婚的先例，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进行结婚仪式，所以阻止他们结婚。但是加亚·庞古斯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前卫、勇于改革的国王，因此他拒绝并违反那个长老的忠告，坚持与江金花结婚。这位自加亚·庞古斯的父亲以来已经成为长老的西瓦甘玛，便预言帕纳拉穹城会遭遇一场灾难。最后，狂风暴雨把帕纳拉穹城摧毁，国王和江金花带着人民离开佩努里散山顶，往东到现在的平安（Pinggan）地区去。在那里，大雨已经停止了，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因为这是巴厘人（加亚·庞古斯）和中国人（江金花）建立的王朝，所以该王朝取名为巴陵江（Balingkang），这个王



朝是由还忠诚于加亚·庞古斯的巴厘人和中国人组成的。那个时候，夏班达和加亚·庞古斯还有一个协议，假如国王要娶他的女儿江金花的话，便允许把中国铜钱作为交易的工具，因为在这之前巴厘岛还是物物交换，并没有用来进行交易的货币。加亚·庞古斯答应了，因为他很喜欢江金花。协议与婚礼完成，一段时间过后，一些小国、地区和村落成为巴陵江王朝的属地，比如‘Pinggan’、‘Sekwana’（现在叫Sukawana）、‘Kintamani’，都是混合巴厘人与中国人的村落。”

退休教师黄先生也说：“‘Balingkang’的意思就是‘江姓’的‘巴厘’，国王娶了江金花后，把一些土地分封给江金花的亲戚和其他华人。如今在金达玛尼地区还有一些以中文命名的村落，如‘Pinggan’村源自‘平安’、‘Langgahan’²⁰村源自‘南安’、‘Songan’村源自‘宋安’（图7）、‘Lampu’²¹村就是‘南福’。虽然现在这些村落里的村民们肤色与当地没有差别，已经看不出来是华人了，但如果在春节前夕过去那里，他们会把甘蔗绑起来摆在门口，家里会有香炉、祖先的神位”（达萨那，写作者谈话，巴厘岛邦利县Demulih村，2019年7月24日）。可见，这类传说故事的流传不仅为了解释如今金达玛尼区平安村巴陵江庙最初的建立，也反映了早期中国人移居到巴厘岛的金达玛尼，和当地人通婚并融入当地社会的历史过程。

²⁰ “Desa Langgahan”位于佩努里散山以西南方向约16公里处，是邦利县金达玛尼地区其中一个有华人聚居的村落，当地有一座中国式的观音庙（Tempat Ibadah Kwan Im Ma）。

²¹ “Dusun Lampu”位于佩努里散山以西方向约13公里处，是邦利县金达玛尼地区其中一个有华人聚居的村落，当地有一座华人墓园（Kuburan China Lampu Dharma Semadhi）。



曾任新加坡驻印尼大使的李炯才，于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中，也有提及一则与上述传说类似，并且把“郑和”融入故事中的版本。他在文中透露其曾访问一位90高龄住在登巴萨（Denpasar）的第三代华人陈祥，陈氏告诉他：传说郑和的船队开抵巴厘，其中一艘船飞到巴杜尔湖。金达玛尼和巴杜尔湖的美丽景色，深深地吸引了船上的一位姓“江”（Kang）的厨司，不久，他爱上了一位巴厘舞蹈员，因此决定离开他的船只。江厨司跟巴厘女子结婚后，生下一位女儿名叫江金花。她长得美丽动人，使巴厘国王娶她为王后，还把国土称作“巴陵江”，这是由“巴厘”（Bali）和王后的“江”（Kang）姓拼成的（李炯才1979: 91）。在中外史籍中，并无提及郑和船队曾经到过巴厘岛。²² 暂且不谈郑和船队到底有没有去过巴厘岛，这个故事版本，应该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来到巴厘岛的中国移民或是近当代崇拜郑和的当地华人附会编造出来的，传说人物江金花竟然与史实人物郑和扯上了关系。

另一些广泛流传于在巴厘岛各地的神话故事版本，则用来解释巴厘传统舞蹈“巴隆·兰东”（Barong Landung）的起源。这类神话的版本也非常多，例如在当地学者苏里斯亚瓦蒂（Ir. Sulistyawati）一篇有关“巴隆·兰东”的文章中，便收录了4则与古巴厘国王和江金花有关的“巴隆·兰东”起源故

²² 明代正史、“郑和三书”等中国史料仅提及郑和船队曾到过爪哇岛等地；《郑和航海图》里也只标明了“爪哇国”的位置，并无标注巴厘岛；爪哇史料《三宝垄与井里汶华人编年史》（*The Two Kronik Tionghoa of Semarang and Cirebon*）也没有提及郑和船队曾到过巴厘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巴厘岛紧邻爪哇岛，郑和的船队前往或离开爪哇岛时可能途经巴厘岛，只不过有没有在该岛停留则是个未知数。



事，情节不尽相同（Sulistyawati 2011: 105-132）。尽管一些情节或细节有所不同，这类有关“巴隆·兰东”起源的神话，其基本桥段皆是国王与江金花因卷入和达努女神的三角恋而被杀死，当地人与华人为感念他们，制作以他们为原型的黑白人偶。

我在此引用另一位当地学者班登（I Made Bandem）的文章里且在当地流传比较普遍的故事版本：话说国王加亚·庞古斯和江金花两人婚后非常相爱，但相处数年仍没有子嗣。国王决定到巴杜尔山（Gunung Batur）下的巴杜尔湖边（Danu Batur）设立一静修院，在那里静修冥想，祈求神明赐予子嗣。²³一天，国王冥想结束后到湖边散步，突然看见有一位貌美女子在湖中洗澡。²⁴那个女子叫达努女神（Dewi Danu，或称“巴杜尔湖神”），是巴杜尔山神（Batari Batur）的女儿。国王尝试接近达努女神，并谎称其仍单身，达努女神也喜欢上了国王。两人便在巴杜尔山神的见证下结婚，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另一方面，江金花见国王许久未归，便在一些巴陵江人的引领下来到巴杜尔山下的静修院寻找国王。江金花亲眼见到国王和达努女神在一起，非常生气，与达努女神发生激烈争执。最后，巴杜尔山神利用神通把江金花和欺骗其女儿的加亚·庞古斯变成石像。²⁵国王和江金花去世后，许多巴陵江人民非常想念他

²³ 另一个说法是国王为了寻找能让江金花生下孩子的方法或药物而来到巴杜尔山；也有的说国王找药时迷路而来到巴杜尔湖一带，遇见了达努女神。

²⁴ 关于国王遇见达努女神的情节，有很多说法，有的说国王是在一山洞里遇见达努女神；有的说是达努女神趁国王敬拜神明时主动诱惑他。

²⁵ 关于国王和江金花去世的情节，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巴杜尔山神用第三只眼睛发出的神火将两人烧成灰烬；有的说是达努女神觉得受骗



们，便请求巴杜尔山神的应允，制作象征国王与江金花的人偶以作纪念，并且在庙里供奉他们（Bandem 2011: 92-94）。

据说如今在佩努里散山顶上，有一座名为特格·柯利班的神庙（Pura Tegeh Koripan，又名佩努里散山顶神庙），庙里陈列着历代古巴厘国王的石像，其中有一对夫妇石像，男性石像便是加亚·庞古斯，女性石像则拥有一些中国人的特征，便是江金花，全巴厘岛的华人都会祭拜她（Sulistyawati 2011: 17）。此外，在平安村附近的巴陵江庙里，也有一座中国式的小祠堂，据说是当地人为了供奉江金花而设立的。该祠堂的神龛上没有神像，只有一个牌子注明其神祇名为“Ratu Ayu Mas Subandar”。²⁶ 在一些特定日子或节日，会有许多来自巴厘岛各地的当地人与华人专程前来参拜，缅怀这位传说中嫁给了古巴厘国王的中国王后（图8、图9）。



图8：巴陵江庙大门口
（摄于2017年8月30日）。



图9：巴陵江庙内供奉江金花的中国式祠堂，每逢节日有许多善信前来参拜（摄于2019年7月26日）。

而利用神力将他们俩变成石像；有的说是国王想跟江金花回去，达努女神阻止而将他们变成石像。

²⁶ “Ratu” 的意思为“统治者”（penguasa/ruler）；“Subandar” 一词源自“bandar”（城市），意思是“港口”（pelabuhan/port）。因此，该牌子的大意为“港口统治者”。见于 Sulistyawati（2011:15）；Qin（2023: 79）。



图10：巴隆·兰东的两尊巨型黑白人偶
（摄于2019年8月1日）。

不过，上述版本的神话故事主要的叙述动机，还是用以解释“巴隆·兰东”舞蹈里两尊巨型黑白人偶的由来。“巴隆·兰东”是巴厘岛相当有名的一种传统舞蹈，一般是用两

尊巨大人偶来呈现表演。该两尊人偶相当巨大，高度至少在两米以上，一尊是黑色的，另一尊是白色的（图10）。黑色人偶象征古代巴厘当地男性，以加亚·庞古斯为原型，皮肤黝黑、长着獠牙，面目有点狰狞，被称为“Jero Gede”；白色人偶则代表来自中国的女性形象，以江金花为原型，皮肤白皙、细长眼睛、面带微笑、穿着中式长裙，样子比较和蔼，被称为“Jero Luh”（Bandem 2011: 83）。许多巴厘岛的居民们相信这两尊巨型黑白人偶具有驱除邪灵、赶走病魔的神奇力量，因此，在某些特定日子和节日，或是当地发生瘟疫、灾害时，村民们就会举行驱邪仪式，寻求神明的帮助，以便驱赶阻碍村落发展的邪灵或恶魔。祈求完神灵后，该两尊黑白人偶便由巴隆·兰东的舞者扛着，在村落各处巡游，并且到每一家每一户前跳舞（Sulistyawati 2011: 116）。值得一提的是，在巴厘岛某些地区²⁷ 甚至有五尊人偶一组的“巴隆·兰东”，这类“巴隆·兰东”体型比较小，可让舞者穿套身上。该五尊人偶中，

²⁷ 根据斯瓦迪亚纳印度长老（Jero Mangku Oka Swadiana）的说法，在Banjar Tegehsari、Banjar Anyar等地有五尊人偶一组的“巴隆·兰东”。见于Swadiana（2008: 64）。

除了上述以国王和江金花为原型制作的黑白人偶外，另外三尊则是改编自中国“梁祝”故事中的“山伯”（Sampik）、“马春”（Macun）²⁸和“娘惹英台”（Nyonya Ingtai）。在某些特定日子，也会以巴厘岛版《山伯英台》（Sampik Ingtai）²⁹故事中的一些情节来呈现该舞蹈（Swadiana 2008: 64-65）。

根据登巴萨州立兴都达玛学院（Institut Hindu Dharma Negeri Denpasar, 简称IHDN）的教授因杜加（Prof. Induja）所述，有关巴厘王加亚·庞古斯与江金花的故事，在当地古代文献里并无记载，这些故事原本只在巴厘岛东北部金达玛尼（Kintamani）山区一带的人民之间口耳相传，但自从巴厘野生动物园（Bali Safari）园方将其改编成一出大型歌舞剧“巴厘·阿贡”（Bali Agung），每天于园内的歌剧院中上演之后，其故事便广为流传，如今为许多当地人与外国游客所知晓。（因杜加教授，写作者访谈，巴厘岛登巴萨，2019年8月4日）。

“巴厘·阿贡”歌舞剧版本的爱情故事，主要改编自“巴厘·兰东”的神话。故事一开始呈现的是巴厘岛在国王加亚·

²⁸ 在原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英台被迫嫁予“马文才”，而巴厘岛改版的故事则将“马文才”改成了“Macun”。

²⁹ 我在巴厘岛访问了好几位当地人与华人，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会提到“Sampik Ingtai”，并将之与巴厘王和江金花的爱情故事作比较，可见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在巴厘岛也流传相当广泛。其中一位受访者是印度达玛州立学院（IHDN）的教授因杜加（Prof. Induja），他告诉我“Sampik Ingtai”的故事在巴厘岛北部很有名，有趣的是，该故事已被“本土化”改编，“Ingtai”仍然是来自中国的女子，而“Sampik”则变成了巴厘岛本地男子。从两位主角的背景来看，巴厘岛版的“梁祝”的确与“巴厘王与江金花”的故事有点类似，可能两者是有关联的，也许“巴厘王与江金花”故事编造者最初的一些灵感便是来自于“梁祝”。



庞古斯的英明治理下，一片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某天，一艘中国商船来到巴厘岛，一群中国商人登岛，并带来许多礼物。中国商人头领前往王宫会见巴厘国王，国王看见随行的商人头领女儿江金花，对她一见钟情，决定娶她为妻。就这样，一场显示巴厘岛与中国友好交往的婚礼，在许多表演者、动物的歌舞表演衬托之下欢腾地举行。然而，国王与江金花成婚多年，仍无子嗣，国王便带领几位侍卫，乘船出海寻找能让江金花生下孩子的灵丹妙药。不料，国王的船在海上突遇狂风巨浪，险象横生，最后整船翻覆，国王随着海浪漂流到一座奇幻的森林。在森林里，国王遇见了达努女神，女神百般诱惑国王，并告知国王他再也回不去巴厘岛了。国王无奈之下，只好与达努女神结婚，两人生下一个儿子。另一边厢，江金花见国王许久未归，便与几名侍卫一起寻找国王。当江金花一行人来到这座奇幻森林，遇见一个小孩，循着小孩回家的路，终于找到了国王，而那小孩便是国王与达努女神的儿子。国王欲与江金花一起回到巴厘岛，然而达努女神坚决不让他们回去，双方展开一场恶斗。最终，达努女神利用神通把国王与江金花变成石像。巴厘岛人民非常感念国王与江金花，便制作象征两人的巨大人偶。当表演者们将两尊大型黑白人偶搬出，亮相于舞台前，伴随着伤感的音乐与庄严的氛围，全剧结束（图11）。

值得一提的是，梁先生曾向我透露，巴厘岛野生动物园的老板是印尼华人，姓蔡，共有三兄弟。除了巴厘岛外，他们在泗水和雅加达（应该是西爪哇茂物）另有两家野生动物园。根据网上资料，该三兄弟为蔡亚声、蔡亚光和蔡亚兴，其父蔡锦贤来自上海，父母和兄长皆死于日军的轰炸，蔡锦贤被迫来到印尼白手起家，最初经营马戏团，数十年来到群岛各





图11：巴厘·阿贡剧照（摄于2019年7月21日）。

地巡回表演。1980年代，蔡锦贤带着三个儿子在西爪哇茂物县（Bogor）开设了东南亚首家野生动物园（顾时宏2013）。巴厘岛野生动物园则在2007年10月开幕，园内建有一座能容纳1200位观众的歌剧院，成了该园的一大特色。梁先生曾询问其中一位蔡老板：为何要在动物园里盖歌剧院，演出这个故事？蔡老板说这是为了保留这个故事、传承中国文化，以及发扬巴厘岛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不难想象在“巴厘·阿贡”歌舞剧版本的故事里，为何将加亚·庞古斯和江金花塑造成“为爱不惜牺牲性命”的人格形象，而达努女神则“无辜地”成了该版本故事里完完全全的反派。其实，我在金达玛尼一带考察时，曾乘船前往参观建在巴杜尔湖湖上的一座巨型“达努女神”雕像，当地人便告诉我达努女神是巴杜



图12：巴杜尔山和巴杜尔湖
（摄于2019年7月27日）。



图13：巴杜尔湖上的达努女神像（摄于2019年7月27日）。

尔湖一带的守护神，保护这里的村庄与人民能和平安宁、安居乐业，可见她在当地人心目中完全不是心肠歹毒的恶神（图12、图13）。

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另一段以古巴厘国王和达努女神的故事为基础，从而衍生出来的关于加亚·庞古斯儿子的神话故事，有趣的是，这个版本的故事也把达努女神的儿子描述成“暴君”的形象。传说古巴厘国王加亚·庞古斯与达努女神所生的儿子名叫玛雅·达纳瓦（Maya Danawa），在加亚·庞古斯死后继承了王位。玛雅·达纳瓦天性凶残，凭借他的天生神通到处为非作歹，并且自比神明而禁止人民敬拜其他

众神，导致巴厘岛连年天灾，民不聊生（Pariadnya 2015: 2）。众神派出了天神因德拉（Bhatara Indra）率领天兵天将讨伐玛雅·达纳瓦，然而，玛雅·达纳瓦神通广大，因德拉一时之间拿他没办法。

因德拉的军队驻扎在淡帕西陵（Tampak Siring）时，玛雅·达纳瓦趁夜变出一座有毒的水池，许多因德拉的士兵因误喝该水池里的水而中毒倒地不起。因德拉见状，随即拔出宝剑，向天祈祷赐予解药，然后一剑插入地面，顿时涌出大量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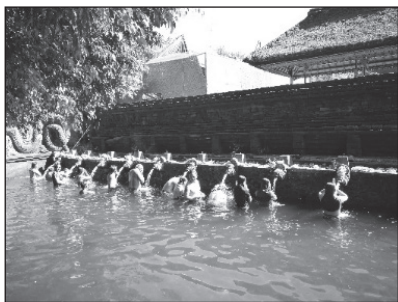


图14：当地人在圣泉寺的水池沐浴，祈求好运平安（摄于2017年8月30日）。



图15：加隆安节时当地人到寺庙里祈祷（摄于2019年7月25日）。

士兵们喝了泉水后都痊愈了，最终因德拉把玛雅·达纳瓦打败。自此该泉水涌出之处被巴厘岛民视为神圣之地（Narendra 1963: 105），后人此地盖了一座神庙，这就是如今淡帕西陵的圣泉寺（Pura Tirta Empul）建立的由来。另外，在约16世纪成书的巴厘传统史书《乌萨那·巴厘》（*Lontar Usana Bali*）有提及，加隆安节日（Hari Raya Galungan）³⁰的庆祝是为了纪念因德拉战胜玛雅·达纳瓦，因此往后的巴厘人都将这个神话故事隐喻为印度教思想中“正义”（dharma）与“邪恶”（adharma）之间的对抗，正义终将取得胜利（Arwati 2007: 12-13）。总的来说，这个版本故事的产生与流传，便是用来解释淡帕西陵圣泉寺的建立，以及巴厘岛民庆祝加隆安节日的由来（图14、图15）。

³⁰ 加隆安节是巴厘岛印度教徒最重要的节日，相当于中国人的春节，每六个月（巴厘岛历）或210天庆祝一次，每次庆祝持续11天。“Galungan”一词来源于“Galung”，即“战争”的意思，巴厘岛人庆祝加隆安节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正义之神（dharma）在与邪恶魔鬼（a-dharma）之间的战争中获得胜利。

我在邦利县考察时，正逢巴厘岛人们庆祝加隆安节的前几天，民宿老板非常好客，带我与其亲朋好友一同参加当地的加隆安节庆典。好几位当地人告诉我加隆安节的由来时都提及玛雅·达纳瓦，说他是加亚·庞古斯的儿子，但是是个坏蛋或暴君，这不禁让我心中产生了一些疑问。我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为何某些版本的神话里“达努女神”和其与加亚·庞古斯所生下的儿子“玛雅·达纳瓦”会被丑化为故事中的反派？即便玛雅·达纳瓦后来继承了古巴厘王位，掌握国家大权。

关于这个问题，邦利县的文化工作者与巴陵江庙的印度教长老的猜测与说法都是一样的。巴陵江庙长老卡迪（I Nengah Kadi）认为：“一般人是这样说，玛雅·达纳瓦是加亚·庞古斯的儿子，也是加隆安节日的由来，不过我不曾读过有关的历史，无论是书本还是学术研究有这么说。如果是民间传说，这可能有政治因素在里头，因为那个时候说玛雅·达纳瓦是一个怪物，也许这是其中一个由满者伯夷人制造的传说，为了在那个时候可以统治整个巴厘岛……许多巴厘土著不愿臣服于满者伯夷侵略者的统治，所以便制造了暴君玛雅·达纳瓦的故事让巴厘人民厌恶其本来的政权。直到现在，有些巴厘岛人仍不愿接受满者伯夷统治巴厘岛的这段历史。”邦利县的文化工作者则更详细地说明了其中原委：“这也许是满者伯夷人给予的政治问题，说加亚·庞古斯的儿子玛雅·达纳瓦是坏蛋，这也是我的理解。我曾经读过几本相关的书，再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进行比较，玛雅·达纳瓦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维持巴厘岛的统治，不想让满者伯夷占领。在玛雅·达纳瓦和满者伯夷作战的时期，满者伯夷军队说自己是因德拉神的军



队，因为因德拉在巴厘岛信仰里是众神的领袖，所以他们自称是因德拉。加亚·庞古斯的儿子玛雅·达纳瓦变成坏蛋的这段历史，也许是满者伯夷人写的，不过到现在，巴厘岛人继承了这个说法，因为加隆安文化中的正义（dharma）战胜邪恶（adharma），来自满者伯夷文化，所以造成加亚·庞古斯的儿子玛雅·达纳瓦在人们心目中是坏蛋。但是，有一些故事版本说，他并不是坏蛋，他是要保卫巴厘岛，因为满者伯夷要在这里扩张势力，他进行反抗，所以他被满者伯夷政治性地丑化，扭曲其形象为坏蛋。根据那段故事，这个坏蛋儿子不愿去庙宇、不愿敬拜神明，他被编造有这些问题。在玛雅·达纳瓦之后，巴厘岛有个国王名叫拉纳·布米·班登（Ratna Bumi Banten）³¹，也被满者伯夷政治丑化。这样是很平常的，如果是我写历史的话，我的祖先和后代肯定是写得好好的，曾经做过的坏事不记载，好的事情才记载，也许大多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历史记载都是这样的，这取决于谁来写这段历史”（卡迪长老，写作者访谈，巴厘岛巴陵江庙，2019年7月26日）。他对历史与“历史叙述”的一番看法相当值得深思。

综上，可知“古巴厘国王与江金花”的故事，有传说、有神话，版本众多，情节各异，说明其故事产生非常久远，流传相当广泛。各版本故事的叙述动机都不尽相同，主要是为了追溯巴厘岛中国文化影响的滥觞、巴陵江庙建立的由来，以及巴隆·兰东的起源。由此又衍生出玛雅·达纳瓦的神话故事，借以解释圣泉寺建立的由来以及庆祝加隆安节日的渊源。

³¹ Sri Astasura Ratna Bumi Banten是古巴厘王朝最后一位君王，其在位时间为1337年至1343年。1343年满者伯夷宰相加查·马达（Gajah Mada）率领军队占领巴厘岛，古巴厘王朝灭亡。



可见，“古巴厘国王与江金花”的故事几乎融入了巴厘岛的历史、宗教、文化与生活，并已成为当地社会文化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三、历史上的加亚·庞古斯以及巴厘岛与中国的关系

上一节内容主要以故事的叙述动机作为出发点，探讨与分析各版本巴厘国王与江金花的传说与神话，而这一节则主要依据巴厘岛现有的考古资料，考察这些传说神话的真实性问题。尽管上述传说与神话都带有一些奇幻色彩与超现实的情节，加上现有的中国史料与当地文献皆无法为其真实性提供有力的支持，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些故事都是虚构的？没有任何历史成分？完全没有参考价值？我个人认为其实不尽然。或许我们可以先从加亚·庞古斯时代留下的铜片碑铭（*prasasti*）³²开始着手，寻找其中是否有关于江金花及其故事的任何线索。

根据当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加亚·庞古斯是古巴厘王朝时代留下最多碑铭的君王（图16），截至2015年为止，在巴厘岛各地已发现的由加亚·庞古斯所颁布的碑铭共有49组，

³² 古巴厘王朝的碑铭大多数篆刻于铜片上，也有少数刻于石像的背面。这些铜片碑铭一般收藏于寺庙里的特定祠堂内，所使用的语言依序为梵文、古巴厘文和古爪哇文（按年代发展顺序）。最早（19世纪末）研究、解读并出版古巴厘碑铭的皆为荷兰学者，如：J. L. A. Brande、Van Stein Callenfels、W. F. Stutterheim、R. Goris等。见于Goris（1962: 1-2）。一组铜片碑铭可能由好几片铜片组成，因此本文以“组”作为其量词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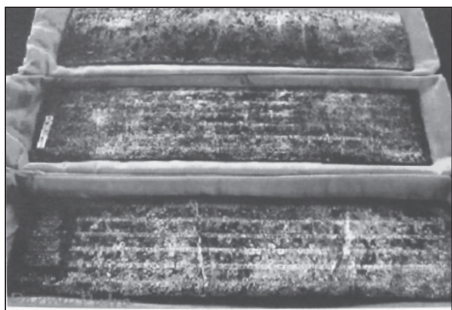


图 16：加亚·庞古斯的铜片碑铭（翻拍自Penerusan Sejarah Sri Maharaja Haji Jayapangus一书第iii页）。

年代都介于1177年至1181年之间（Pemerintah Kabupaten Gianyar 2015: 50-51）。起初，荷兰学者根据加亚·庞古斯碑铭的最早与最晚年代，认为其在位时间不过四年。不过，经过一些当地学者进一步研究后，

目前皆认为其在位不可能仅仅四年，或许加亚·庞古斯实际掌政时间长达30-40年。³³ 加亚·庞古斯所颁布的大部分碑铭，主要记录加亚·庞古斯政府于各个地区所订立的税收制度和法令条文，以及讲述其如何调解当时巴厘岛内各个城镇和村落的矛盾纠纷（Pemerintah Kabupaten Gianyar 2015: 146, 3）。其中，在一组名为“Prasasti Sembiran C No. 621”的碑铭里，叙述加亚·庞古斯统治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整个巴厘岛，辖下有七个属国（Pemerintah Kabupaten Gianyar 2015: 21）。另有几

³³ 当地学者之所以认为加亚·庞古斯可能执政长达30-40年，主要理据是1177年加亚·庞古斯第一组碑铭颁布之前，目前只寻获国王拉格加亚（Raja Ragajaya）于1155年颁布的一组碑铭与之年代最接近，换句话说，在1155年至1177年间有长达22年的历史真空期。在加亚·庞古斯其余碑铭于1181年颁布之后，直到1200年国王埃卡加亚（Raja Ekajaya）才颁布了其第一组碑铭，其间又有19年的历史真空期。此外，在一些加亚·庞古斯的碑铭里，叙述其在位时势力范围达到整个巴厘岛，下辖7个属国，拥有无上权势，按逻辑不可能仅仅在位四年便能做到。因此，当地学者大致估算其在位时间可能长达30-40年。见于Tim Penelusuran Inventarisasi dan Transkripsi Prasasti Bali Kuna（2004: 10-11）。

组碑铭也叙述加亚·庞古斯是一位有能力、有智慧并且爱惜子民的君王（Pemerintah Kabupaten Gianyar 2015: 9-10, 22）。因此，大部分当地学者皆认为加亚·庞古斯是古巴厘王朝时期一位伟大的君王，其统治期间，致力于解决了巴厘岛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冲突，制定各个地区人民应遵守的法规，使巴厘岛进入文明的黄金时代，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在巴厘岛的历史地位能够与满者伯夷最伟大的君王哈炎·巫禄（Hayam Wuruk³⁴, 1350-1389）相提并论（Pemerintah Kabupaten Gianyar 2015: 21）。

在已发现的49组碑铭中，年代最早的是“Prasasti Mantring A No. 601”，也是唯一一组颁布于1177年的碑铭，其开篇提及国王的完整封号为“Paduka Sri Maharaja Haji Jayapangus”，叙述其向所有的大臣们发布政令，其大臣名单中便有印度教长老与佛教长老（pendeta Siwa dan Buddha）（Tim Penyusun Purana Pura Silayukti 2008: 136）。这显示了巴厘岛在加亚·庞古斯时期可能以印度教为尊之外，佛教也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与“信佛的江金花嫁给信印度教的国王”的故事背景相符。另一方面，或许“巴陵江庙由来”故事里称加亚·庞古斯拥有印度教和佛教谏官（即“谏官西瓦·甘都”和“谏官林”）那段情节的产生，便是来源于当时古巴厘政府中确实有任命印度教与佛教长老为大臣的惯例，而故事中的佛教谏官

³⁴ 哈炎·巫禄（Hayam Wuruk, 1350-1389）是满者伯夷王朝第四任君王，也是满者伯夷乃至印尼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哈炎·巫禄在位期间，任用加查·玛达（Gajah Mada）为宰相，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使满者伯夷国力进入巅峰时期，统治的领土包括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其势力范围甚至一度到达泰国南部、菲律宾、东帝汶等地。



姓“林”，可以推测或许在加亚·庞古斯时期曾经任命过中国人为佛教长老。

除去颁布于1177年的“Prasasti Mantring A No. 601”，加亚·庞古斯的其余48组碑铭，皆颁布于1181年，其中有26组碑铭的开篇除了刻有国王加亚·庞古斯的封号，也述及加亚·庞古斯是在两位王后的陪同下共同向大臣们发布政令。该两位王后的封号分别是“Sri Paduka Parameswari Induja Ketana”和“Paduka Sri Mahadewi Sasangkaja Lancana/Cihna”（Tim Penyusun Purana Pura Silayukti 2008: 14-15）。一些当地学者认为“巴隆·兰东由来”故事里达努女神的原型便是第一位王后，信奉印度教，来自巴杜尔湖一带。而第二位王后的封号后有注明“Cihna”字眼，推测这位王后应该来自中国（Pemerintah Kabupaten Gianyar 2015: 247），她可能便是民间传说中江金花的“历史原型”。因此，根据该26组碑铭中的记录，可推断加亚·庞古斯可能娶过一位中国女子为王后，历史上也许真有类似“江金花”的中国女子嫁给了加亚·庞古斯。

另一方面，再将该26组碑铭中提及“加亚·庞古斯由两位王后陪同”的记录，比照此前于1177年颁布的“Prasasti Mantring A No. 601”中仅提及加亚·庞古斯一人，并无提及两位王后，可以推测加亚·庞古斯可能是在1177年至1181年之间娶了包括该中国女子在内的两位王后。换句话说，加亚·庞古斯的碑铭资料告诉了我们该国王的有可能娶了一位中国女子，这位中国女子可能就是民间传说中“江金花”的原型，国王与该中国女子的结合可能发生于1177年至1181年间，对照中国的朝代，当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

有趣的是，如今在巴厘岛发现的中国历朝铜钱的数量，



也能够说明宋代时期中国人与巴厘岛的关系非比寻常。古代铜钱收藏家哈达万在其《中国铜钱于社会仪式》（*Uang Kepeng Cina Dalam Ritual Masyarakat*）中，曾把登巴萨考古中心（Balai Arkeologi Denpasar）、巴厘古文物中心（Balai Peninggalan Purbakala Bali）、巴厘博物馆（Museum Bali）的考古发现与馆藏铜钱，以及包括自己在内的数位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国古铜钱进行统计分类，得出表1数据：

表1：巴厘岛公家单位与私人领域收藏的历代中国铜钱

序号	收藏来源	中国朝代						数量 (枚)
		汉代	唐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1	登巴萨考古中心	-	-	21	-	1	67	89
2	巴厘古文物中心	-	3	28	-	4	186	221
3	巴厘博物馆	2	66	747	1	122	752	1,690
4	私人收藏	12	25	475	6	72	4,910	5,500
总数		14	94	1,271	7	199	5,915	7,500

资料来源：Harthawan（2011: 33）。

根据上表，可知截至2011年为止巴厘岛三个公家机构及几个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国古代铜钱总数为7,500枚，其中汉代铜钱有14枚（0.19%）；唐代铜钱有94枚（1.25%）；宋代铜钱有1,271枚（16.95%）；元代铜钱7枚（0.09%）；明代铜钱199枚（2.65%）；清代铜钱有5,915枚（78.86%）（Harthawan 2011: 30-34）。清代铜钱之所以占其中的大多数，主要由于



私人收藏家收藏了大量的清代铜钱（4,910枚），使得清代铜钱所占百分比大大提高。哈达万在书中也谈及其收藏古铜钱的经验，他透露在1990年代还能常在巴厘岛各地的传统市场上买到古代铜钱，这是私人收藏家们获取古代铜钱的主要方法（Harthawan 2011: 32-33），因此不难理解收藏家们的收藏品中大多数是清代的铜钱，这些清代铜钱在一般的传统市场上相对容易购得，并非真正“掘地三尺”的考古所得。如果仅关注巴厘博物馆的馆藏与考古发现，在总数为1,690枚的历朝铜钱中，有将近一半是宋代的铜钱（747枚），其数量竟然与清代铜钱（752枚）几乎相同，这就显得有点不太寻常。

众所周知，清代在时间上距离当代较近，清代中国人的航海技术理应较前代人进步，东南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商贸往来也更加频繁，而清末也有大量福建、广东人移居东南亚各地。因此，在巴厘岛能找到的清代铜钱比起前代的铜钱更多，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如今在巴厘岛却也能够出土或寻获那么多的宋代铜钱（1,271枚），甚至比宋代更晚的明代铜钱（199枚）还多出5倍有余，足以说明宋代时中国人与巴厘岛的商贸往来非常频繁，这些宋代铜钱多半是当时中国的商人或移民带过去的。宋代人带来了大量铜钱与中国货品，与当地相互交易，使铜钱渐渐成为当地主要的货币，正如《宋史·食货》里所说的“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明初的马欢和巩珍等数次随郑和船队来到仅与巴厘岛一水之隔的爪哇时，曾见证在杜板（Tuban）、新村/革儿昔（Gresik）、苏鲁马益（Surabaya）等地已有大量中国人聚居；当地人非常喜欢中国的青花磁、麝香、花绣、紵丝、硝子珠等商品；当地所有买卖皆使用中国历代铜钱进行交易



（马欢1937: 14-24；巩珍1961: 4-5），而在苏门答腊的旧港（Palembang），也有许多广东、漳州、泉州移民，当地交易也使用中国铜钱和布帛（马欢1937: 25-28）。此外，16世纪初居留马六甲三年（1512-1515年）的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Tome Pires）也曾从爪哇商人或水手那里听闻“中国的一位国王派其一女来到爪哇与满者伯夷国王结婚，并带来大量的钱成了那里的货币”、“在爪哇的中国钱是被带来爪哇做交易用的”、“中国人早在马六甲出现之前便已经在爪哇进行贸易”等传闻。³⁵至于巴厘岛，也有当地碑铭资料显示最晚在14世纪末已有岛民使用中国铜钱来缴纳赋税，中国铜钱长期作为巴厘岛的交易货币，与《瀛涯胜览》等中国史料以及《东方志》里的上述记载基本吻合且相互呼应。巧合的是，16世纪初的爪哇人也以“中国公主（女子）嫁给当地国王并引入铜钱”的说法向皮列士解释中国铜钱成为当地交易货币的缘由，说明巴厘岛的“江金花”故事并非孤例。

可见，“古巴厘国王与江金花”故事最初的产生，便是源于南宋时期中国人与巴厘岛民商贸和往来非常频繁的真实历史背景。我们将中、外史籍里中国人在爪哇等地的相关记

³⁵ 皮列士《东方志》里的原话中译为“他们说爪哇人过去与中国人有亲缘关系，中国的一位国王派其一女来到爪哇与巴塔拉·拉惹·库达（Batara Raja Quda）结婚。他（中国国王）把她和许多中国人一起送到爪哇，他送来的钱（he sent the money in the cash）现在成了这里的货币（currency），他们说用一艘帆船将它们载来。那个国王是中国国王的附庸，（那些钱）不是中国国王缴纳的贡品，并且爪哇人背信弃义（treachery），杀死了当时在爪哇的所有中国人……又有其他人说并非如此，国王从未与另一位国王有血缘关系，也不认识另一位国王，在爪哇的钱是被带来爪哇做交易用的，因为早在马六甲出现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在爪哇进行贸易了。”见于Pires（1944: 179）。





图 17：巴厘博物馆内展示以铜钱制作的艺术品（摄于2017年9月2日）。

载、古巴厘时期加亚·庞古斯碑铭里的记录、当地出土大量宋代铜钱的实际情况，以及“江金花”的故事里要告诉我们的种种信息等线索统统串联起来，可以推测或许在南宋时有一

些中国商人经常到巴厘岛西北部港口一带经商，可以推测或许在南宋时，有一些中国商人经常到巴厘岛北部港口一带经商，其中的有功者受委任为当地的港务官“苏班达”及成为国王的谏官，有中国商人与当地女子生下的女儿嫁给了巴厘国王，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中国人得到了巴厘国王的同意并且授予土地，来到东北部的金达玛尼山区开垦定居，建立了诸如“平安村”、“南安村”、“宋安村”、“南福村”等以中文命名的村落。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多与当地人通婚，几代人过后，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这些中国人将宋代铜钱、中国文化、经商经验、先进耕作技术等带到巴厘岛，使中国铜钱逐渐成为巴厘岛主要流通的交易货币，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形态与生产模式，丰富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与习俗（图17）。如同加亚·庞古斯与江金花的故事里所描述的，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在当地人之间代代相传，历久不衰近900年，其所要表达的意义与存在价值也正是如此。



也许当初是为了方便故事的传承，当地人或中国移民后裔才会附会地把巴厘岛所有的中国文化元素都归功于江金花与其父两人。因为故事里往往需要有一、两个特定的主人翁加上一些“非一般”的情节，才能让听者留下深刻印象，以便更容易将之传承后世。传说中嫁给了国王加亚·庞古斯的中国女子，便相当符合他们方便把故事传承后代的各种需求，因此，她成为了这个故事里的主线人物，通过叙述她与加亚·庞古斯的一些附会、虚构甚至奇幻的故事来表达与反映当时一些中国人移民巴厘岛，与当地人一起建立了新的王朝，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的真实历史过程，以及解释一些巴厘文化中受中国影响的原因。江金花的传说长期以来通过口耳相传，经过历代人民不断地渲染与艺术加工，其故事不仅与当地巴杜尔山、巴杜尔湖一带的神话角色合流，后来甚至把华人普遍崇拜的史实人物郑和融入其中，衍生出各种真伪莫辨、曲折离奇乃至神怪奇幻的情节与故事版本，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版本的传说与神话。

自从巴厘野生动物园（2007年开幕）园方将其改编成一出大型歌舞剧“巴厘·阿贡”后，古巴厘国王与江金花那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便广为流传，为许多当地人与外国游客所知晓。如今，在许多关于巴厘岛文化与旅游的书籍和网站中都能找到这段爱情故事的相关介绍。巴厘王与江金花结合的故事，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在巴厘岛进行商贸与移民等活动的真实历史，象征着巴厘岛的种族和谐、族群融合与文化多元，近年来它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了巴厘岛又一个能够吸引国内外游人尤其中国旅客的亮丽“名片”。



四、结语

中国民俗学研究者钟敬文曾说过：有些传说可能是以曾经发生过的事作为依据的，“并且在传述的过程中，受到了艺术的加工，和原来的事实已经不一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说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它和历史上的记载的事件是有区别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任何传说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因为它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历史现实作为依据的，就是说脱离不了历史的条件，带有一定的历史性”（钟敬文1981:195-196）。可见，传说与历史虽有所区别，但传说的产生与故事的流传或许与真实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传说里的大部分故事情节也许是虚构的，但其中的某些元素与细节也许是来自某件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有它最初的“历史原型”。通过研究这种类型的传说，或许可以填补现有史料文献在记载上的一些缺略和不足。

在本文的研究案例中，把有关“江金花”的各种传说与神话中附会、虚构、奇幻、超自然的情节和元素层层剥离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中国与巴厘岛早期交往的历史图景：南宋时期，有中国商人前往巴厘岛经商；一些有功于巴厘社会的中国人被任命为港口官员或朝中谏官；有中国商人与当地妇女所生之女嫁给当地君王；有中国移民到巴厘岛东北部的山区开垦并建立了几个中国村落；中国移民与当地相互通婚，中国文化巴厘文化相互融合。这段生动的历史，无论在中国史料还是当地史料中都很难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却在与“江金花”有关的民间传说中得到充分体现。

不仅如此，“江金花”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其中一个重



要历史细节，便是宋代中国人把铜钱带来巴厘岛，成为当地流通的货币，至今仍被当成仪式中的祭品的真实情况。如今在巴厘岛当地出土了许多宋代铜钱，宋、明史籍和航海游记甚至葡人文献中都有提及与巴厘岛仅一水之隔的爪哇当地使用铜钱作为货币的情况，都与“江金花把中国铜钱带来巴厘岛”的说法基本吻合，尽管我们也知道把全部的“历史功绩”都归于江金花只是当地人的一种附会。“江金花传说”、“中外文献”、“当地考古证据”三者得以相互印证，填补了中外古代史书对于巴厘岛在文字记载上的缺略。如果说民国史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为我们展示了“以诗文证史”的可能性，那么，巴厘岛“江金花”的传说则为“传说也可以证史”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

参考文献

- 顾时宏2013。〈华裔兄弟经营印尼最大野生动物园〉。《中国新闻网》。2013年6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hr/2013/06-24/4961815.shtml>。
- 巩珍著，向达校注1961。《西洋番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 孔远志1995。〈中华文化在印尼根深叶茂〉。《华人月刊》5: 16-19。
- 孔远志2000。〈珍贵的友谊，动人的传说——记有关郑和在东南亚的民间故事〉。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香港：南岛出版社。488-503。
- 李炯才1979。〈三宝太监及其侍从的神话〉。载《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78-92。
- 刘昫等1995。《旧唐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马欢1937。《瀛涯胜览》。上海：商务印书馆。
- 欧芮2019。〈唐宋时期铜钱对印尼巴厘岛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广西教育学院学报》5: 34-38。



- 汪大渊原著，徐观编2005。《岛夷志略》。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 姚思廉1995。《梁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赵汝适原著，冯承均撰1940。《诸蕃志》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 钟敬文1981。《民间文艺谈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ARDIKA, I Wayan 1991.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ortheastern Bali Indonesia*.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ARDIKA, I Wayan 2009. Blanjong: An Ancient Port Site in Southern Bali, Indonesia. In Elfriede Hermann, Karin Klenke und Michael Dickhardt. *Form, Macht, Differenz. Motive und Felder ethnologischen Forschens*. Göttingen: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251-258.
- ARDIKA, I Wayan and PARIMARTHA, I Gde. 2015. *Sejarah Bali: Dari Prasejarah Hingga Modern*. Denpasar: Udayana University Press.
- ARWATI, Ni Made Sri 2007. *Hari Raya Galungan*. Surabaya: Paramita.
- ASTITI, Ni Komang Ayu 2014. Uang Kepeng Sepanjang Masa: Perspektif Arkeologi dan Ekonomi Kreatif di Provinsi Bali. *Forum Arkeologi*, 27(1): 45-56.
- BANDEM, I Made 2011. Barong Landung Perspektif Sejarah, Fungsi, dan Pergelaran, In *Integrasi Budaya Tionghoa ke Dalam Budaya Bali dan Indonesia*, edited by Ir. Sulistyawati. Denpasar: Universitas Udayana.
- GORIS, R. n.d. *Bali-Cults and Custom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 GORIS, R. 1962. *Ancient History of Bali*. Denpasar: Fakultas Sastra Universitas Udayana.
- HARTHAWAN, I Dewa Nyoman Putra 2011. *Uang Kepeng Cina Dalam Ritual Masyarakat*. Denpasar: Pustaka Larasan.
- NARENDRA, Dev. Pandit Shastri 1963. *Sejarah Bali Dwipa*. Denpasar-Bali.
- PARIADNYA, I Gede 2015. *Babad Usana Bali Pulina: Singamandawa - Bedahulu – Gelgel*. Denpasar: Pustaka Bali Post.
- Pemerintah Kabupaten Gianyar 2015. *Penelusuran Sejarah Sri Maharaja Haji Jayapangus*. Denpasar: Pustaka Manikgeni.
- PIRES, Tome 1944.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 Account Of The East, From The Red Sea To Japan, Written In Malacca And India In 1512-1515*. Vol. I, trans. Armando Cortesao,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 PRINGLE, Robert, 2004. *A Short History of Bali: Indonesia's Hindu Realm*. N.S.W. : Allen & Unwin.



- Proyek Penelitian dan Pencatatan Kebudayaan Daerah 1978. *Sejarah Daerah Bali*. Jakarta: Departme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
- QIN, Weifen 2023. A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lements in Balinese Culture: An Acculturation Perspective. *Jurnal Aristo (Social, Politic, Humaniora)*, 11(1): 71-97.
- SUARBHAWA, I Gusti Made 2010. Perdagangan Pada Masa Bali Kuna: Berdasarkan Sumber-sumber Prasasti. *Forum Arkeologi TH*. XXIII(2): 215-236.
- SUARBHAWA, I Gusti Made and SURYANA, I Nyoman 2013. *Berita Penelitian Arkeologi: Prasasti Sukawana, Desa Sukawana, Kecamatan Kintamani, Kabupaten Bangli*. Denpasar: Balai Arkeologi Bali.
- SUASTHAWA, I Made 1995. *Kebudayaan Bali: Pra-Hindu, Masa Hindu, dan Pasca Hindu*. Denpasar: Kayumas Agung.
- SUDANA, I Nengah and BUDIASTRA, I Putu 2001. *Aktualisasi Uang Kepeng Pada Masyarakat Bali*. Denpasar: Departmen Pendidikan Nasional Direktorat Jenderal Kebudayaan.
- SULISTYAWATI, Ir. 2011. Berbagai Kisah Lahirnya Barong Landung di Bali, Fungsi dan Makna Simboliknya In *Integrasi Budaya Tionghoa ke Dalam Budaya Bali dan Indonesia*, edited by Ir. Sulistyawati, Denpasar: Universitas Udayana.
- SULISTYAWATI, Ir. 2011. Pengaruh Kebudayaan Tionghoa Terhadap Peradaban Budaya Bali. In *Integrasi Budaya Tionghoa ke Dalam Budaya Bali dan Indonesia*, edited by Ir. Sulistyawati, Denpasar: Universitas Udayana.
- SWADIANA, Oka 2008. *Barong Landung, Bernuansa: Magis-Religius*. Surabaya: Paramita.
- Tim Penelusuran Inventarisasi dan Transkripsi Prasasti Bali Kuna 2004. *Himpunan Prasasti-Prasasti Bali: Masa Pemerintahan Raja Jayapangus*. Denpasar: Dinas Kebudayaan Provinsi Bali.
- Tim Penyusun 2009. *Purana Pura Dalem Balingkang*. Denpasar: Dinas Kebudayaan Provinsi Bali.
- Tim Penyusun Purana Pura Silayukti 2008. *Pengumpulan Data Purana Agung Besakih dan Peterjemahan Prasasti Bali Abad XII. Terjemahan Prasasti-Prasasti Bali Abad XII ke Dalam Bahasa Indonesia*. Denpasar: Dinas Kebudayaan Provinsi Bali.

